

70 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 决定因素与历史逻辑

张幼文

内容提要 建国 70 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并且逐步深化,不断递进。对外经济关系战略选择由四个因素决定,国际环境是外部条件,发展目标根本方向,理论依据是指导思想,国内体制是推进条件。四个时期中四大决定因素的变化证明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历史逻辑。

关键词 建国 70 周年 开放战略 国际环境 对外开放理论 开放型经济体制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DOI:10.13516/j.cnki.wes.2019.07.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70 年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持续提升的 70 年。国际经济地位提升一方面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不断增强,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扩大,是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内涵的不断深化。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世界并不是从来就开放的。一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有多种形式,开放并不是唯一的形式,不只是指一国更大的市场准入。广义的一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一种战略选择,但它并非纯粹是某种理念或决心的产物,而是基于国际环境,服务发展目标,根据理论指导,立足体制条件的决策与选择,中国 70 年的发展证明了其中的内在结构和历史逻辑。

一、70 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纵观 70 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这一阶段中国发展战略的定位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朝鲜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和封锁,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虽然在建国初期有来自前苏联的援助,但不久后就中断了,因而立足于国内条件发展经济是这一阶段发展战略的基本点。这一阶段对外商品贸易的定位是互通有无,通过努力发展轻纺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创收外汇以购买工业机器设备是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内容。同时,外商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基本上为空白。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中国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其并非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而是外交与国际战略的需要。香港地区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一个渠道,国内企业通过在香港地区建立分支机构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基于市场的联系。1976 年文革结束后,为加快发展现代大工业,国家引进一批重大项目,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与立足点。这一时期的整个发展战略不是开放型的,因为有限的对外经济联系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 1978 年确定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到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走上对外开放发展道路的开始。大力发展外贸以创造就业和争取外汇,大力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并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推动出口发展是这一阶段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在发展出口的同时进口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关税保护,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许多领域依然保留着限制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进程上看这一阶段的开放是渐进的。出口发展以补贴推动,进口因外汇短缺而限制。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逐步推进外资,采取的是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政策,在某些领域鼓励外商投资,但在另一些领域中则有较多的限制。开放什么,怎样开放是中国自主决定的,而不是为了履行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一类协议的承诺而开放的。

第三阶段是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阶段。加入 WTO 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内涵。大幅降低关税使中国进口市场向开放跨出了一大步,市场准入的扩大使外资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获得使中国产品得以参与公平竞争并能更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国,承诺的国内体制改革与法律修订使中国经济在市场化道路上特别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 世纪 90 年代外资开始大量流入,此后流入速度加快,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市场准入扩大,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后产品在其他世贸成员国更具竞争力。不仅传统产业进一步转移到中国,而且在制造领域的许多新产品生产上中国被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但大部分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环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开始向世界各国投资,特别是资源开发产业的投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一步深化。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又成为世界前二位的贸易进出口国和投资流出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

第四阶段是从 2012 年十八大召开后至今,并将继续。这一阶段在延续了上一阶段中国对世界经济推动作用的同时,突出表现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深度联系。“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倡导的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合作机制,通过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道路,并形成中国与这些国家更广泛的贸易投资关系。这种共同发展模式不同于第一阶段的援助模式,除了一小部分项目仍然为援助外,大部分项目采用国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在这一阶段,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了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市场开放模式,并推广成为全国的开放模式。通过国内自由贸易区试验以开放倒逼改革,国家努力使国内体制与全球化趋势更相适应。

如果说对外开放前三十多年中国主要是把握国际机遇,利用国际环境的话,那么进入新时代则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参与营造国际环境,营造有利于世界发展中国家更好发展的环境。这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意义。

70 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不断增强和深化的。“开放”是一个关键词,但仍然需要具体分析“在什么意义上开放”和“在什么程度上的开放”,而怎样开放的问题则与战略选择的外部因素密切相关。

二、国际环境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外部条件

中国 70 年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即外部条件。国际环境可能提供了某种机遇,也可能是各种约束乃至挑战。

二战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期,此后又进入了中苏对抗阶段,这是中国发展第一阶段国际环境最基本的条件。当两大阵营对抗时,中国在外交上一边倒,经济上也只能一边倒。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空间很小。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中国更只

能完全走自力更生道路,不可能有任何外援。外交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决定了经济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商品贸易,而不可能有高端技术产品或装备进口,不可能有技术合作,因为国家间的基本关系是与政治相关的战略竞争和对抗;也不可能有什么外商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产业和经济被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本质上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合作,是中国在美苏争霸的世界中争取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选择。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来自于邓小平从时代变化上对国际环境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即提出了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重要判断。这一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关于时代的战争与革命的判断。“和平”就是世界大战一时不会打,国家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物力搞建设,也因此可与发达国家合作,对发达国家开放。“发展”这一时代特征表明,各国都在谋求发展,相互合作有巨大的机遇,如果中国不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那么就将被世界的发展所淘汰,被开除球籍,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

事实上,和平是客观的,是需要争取的。当时中国既在北方承受着来自前苏联的大兵压进,又在南方面对着越南谋求地区霸权的骚扰。正是邓小平在整个国际战略上运筹帷幄,才为中国真正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的环境也是要争取的。邓小平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国,营造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及同发达国家合作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走上开放型发展道路后世界经济的历史性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投资迅速发展,其带来的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深化。这就为开放型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选择,即通过资本流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品出口。相反,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发展,完全基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的贸易开始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次要形式。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不仅开放是可能且必要的,而且投资的开放是更加重要的。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标志着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发展为公平贸易体制。2001年这一组织启动了多哈回合谈判,探索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安排,而中国正是在这一年加入这一组织,标志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相互开放的结果,中国需要利用外部市场,就需要融入全球化,这首先就要降低关税和放宽外资流入。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在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长达15年的谈判要求中国适应全球化并向各国更大地开放市场。随着关贸总协定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这要求中国接受这一组织的宗旨即公平贸易,从而涉及国内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要适应开放的要求。因此,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从市场准入上升到体制接轨。世界的发展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第三阶段中外部环境的重要事件,而中国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为自己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创造了新的内涵。在体制接轨的同时,第三阶段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还特别表现在其积极作用上,即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金融危机冲击了世界经济,而因改革开放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却在规模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中国以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为世界抵御这场危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也从此开始了中国影响世界经济的历史。

2012年起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对外经济关系也呈现了新的内涵。中国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本身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特点与走向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不再是只能被动适应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前一轮的发展中,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对中国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除了少数新兴经济体,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影响较小。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尚未全面启动但有着强烈的发展需求,这对中国来说有着另一种意义。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巨大的投资空间,而这正与中国新的比较优势相对应,即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充足的资金积累与外汇储备。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工程承包和产能合作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重要领域。于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的一个新的领域必然形成。“一带一路”建设是第四阶段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最重要主题。“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像发达国家当年所做的向落后国家倾销商品和获取资源,而是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发工业园区实现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也在一个新的意义上说明国际环境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中国国力持续增强之际,世界也出现了百年未遇之历史大变局。民族主义上升、美国退群、英国脱欧,全球化出现逆转态势。尤其是美国不仅保护主义抬头,而且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但美欧日针对中国提出了改革主张,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发展体制正受到新的挑战,市场化进程也出现新的动力。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表明,当中国的发展日益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乃至竞争格局时,中国开放的国际环境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是世界经济日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因中国的变化而变化,守成大国防范新兴大国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的新主题。

三、发展目标与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指向

70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外经济关系战略的选择服务于发展目标,并根据各个时期发展的需要而制定。因此对外经济关系的阶段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时期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

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穷二白,人均收入水平低,温饱问题严峻,经济结构落后,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建立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是新中国的首要目标。在这一时期,前苏联的援助集中于工业项目,在来自前苏联的援助结束以后,现代化的目标只能全部靠中国自身的力量;计划是一种不包括外部市场的经济体制,因为外部是无法被计划的,有限的贸易只是计划不平衡的补充,通过进口部分地支持工业化本身也是计划的内容;发展目标本身的独立性,即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决定了外贸只能是整个发展战略的有限补充,而不可能是所依赖的主要路径;外资是完全不在计划之中的,因为即使外资创造了工业化也不是中国的工业化,何况一旦产业被外资垄断那国民经济就失去了独立性,发展目标也就会丧失。

中国前 30 年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众目共睹的,四个现代化不仅是当年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而且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影响,到 1978 年与飞速发展的世界相比,中国发展的相对不足就呈现出来了。

1978 年中国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由于看到与世界的巨大差距,解决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的规模性增长,特别是首先解决就业问题是摆在发展面前的核心目标。

寻求经济发展的效率一方面要求改革,另一方面要求开放。为了引进国外的管理和技术,开放首先定位于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管理经验。为了进口先进设备与技术,开放又要求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然而实践表明,仅有廉价劳动力而没有质量、品牌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即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发展也是困难的。由外商提供的品牌产品加工组装才是扩大出口的有效路径。于是引进外资发展出口成为中国在这一阶段开放上最有代表性的对外经济关系内容。开放的这一形式既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创造了外汇收入,又拉动了国内就业,对提高国民收入特别是对低端劳动力摆脱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实现更高的增长目标,中国需要外商投资以弥补资金不足,而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于是开放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从为出口发展引进外资扩大到为经济增长引进外资。

由此我们看到第一轮开放的基本特征,即注重增长、就业、出口等规模性目标,而对产业进步、技术

创新、环境保护和分工地位等效益性目标是相对忽略的。1986 年中国提出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核心是为了获得在各国市场上的最惠国待遇即降低关税以扩大出口。

当 15 年后中国完成谈判时,“复关”已经变成了“入世”,中国既获得了各国市场的同等竞争地位,也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制度规范承诺。开放倒逼了改革,国内市场化制度建设成为融入全球化的条件。这一改革要求与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开放更注重靠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那么新阶段的开放则更多注重规范的市场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公平解决投资贸易争端、限制政府补贴、实现政策的更高透明度等制度建设承诺的履行体现了开放的更高水平。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保持较高的速度,同时也要实现更高的水平,科学发展与自主创新成为 21 世纪前 12 年的主题,也决定了开放的形式与内容。科学发展在于注重发展的真实效益而不仅仅是数字与规模。这就决定了提高外贸发展的水平与提升外资引进的质量是基本要求。中国在政策上开始注重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加价值和国内成份的比重,增强一般贸易的竞争力,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与水平;在外资上,注重更多引进技术水平高的投资,注重外资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注重外资的质量与效益。这些都体现了以开放服务发展目标提升。

自主创新目标的提出不是对引进外资开放政策的否定,而是开放的升级。中国开始注重在引进外资水平的同时提高国内的技术进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数量性开放不足的改进,但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引进外资。

中国对外投资的较快发展始于 21 世纪,即上述划分的第三阶段。中国注重海外的资源开发性投资,这是在国内经济规模快速扩大瓶颈显现后的一大战略选择,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解决资源供给。新目标决定了开放主题的重大变化,“走出去”这一新概念诞生了。对外投资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国际并购,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并购。这一开放主题与发展的关系在于继实现了规模性增长后中国需要提升国际分工水平。国际并购可以迅速获得国际大企业的技术、品牌产品和国际市场生产销售网络,使中国能较快地从国际价值链分工低端上升到高端。这不是投资从单向扩展为双向现象上的变化,而是国家发展目标升级决定的开放内涵的突破。引进外资发展出口使中国实现了迅速的资金外汇积累,突破了双缺口的发展瓶颈,也为新阶段上的战略升级创造了条件。

可见,当时所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概括了第三阶段的发展目标,也决定了开放内涵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目标的升级也决定了开放内涵的进一步升级。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从脱贫、致富到国家强盛,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决定了开放的新主题和新内容。

中西部地区从开放的后卫走到了前沿,“一带一路”建设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了可能。东部沿海地区在前两个阶段中以开放实现了发展,但中西部的客观地理条件限制了这一可能。“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拓展了国内的开放布局,而且扩大了国际合作对象与合作空间。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和长远目标,其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从经济方面讲,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发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就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这一重大举措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采用了比世界银行更科学务实的标准,得到了诸多发达国家的认同和参与,许多发达国家也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体现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全新主题,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最新表现。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同样也对开放提出了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决定了外贸外资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不顾环境成本的现象,这就把外贸外资的质量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质量

的贸易与外资,这是中国摆脱低端国际分工的需要,也是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驱动发展,注重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这一发展的指导思想要求引进外资同样需要实现结构升级。

新时代国内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此相应,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也体现了市场化改革要求,即建立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除了不断降低关税外,十八大以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平台的改革开放探索体现了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采用国际通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开放模式,深化政府规范法制透明度改革,打造更为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自贸区试验及其向全国的复制推广使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开放中的表现。

四、指导思想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

从国家战略决策意义上讲,一定阶段的对外经济关系是该阶段某一思想指导下的选择。西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是市场本身在发展中的延伸,与此不同,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各个时期依据不同的理论由政府决策所推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外经济关系定位的指导思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宗旨加上二战后冷战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只能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这一条件结束以后,备战与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更加强了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原则,有计划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其周期性危机规律,因而中国必须防范受危机波动的冲击和影响。有计划按比例方针下可能产生暂时的局部的不平衡,对外贸易则可以实现对余缺的调剂,因此外贸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而不是主体,更不是基本经济机制。建国初期连资本主义的尾巴都要割除,当然更不会引进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该时期自力更生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争取外援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为辅的。有限的对外贸易不是在比较优势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根据互通有无的方针进行的,因为比较优势论是马克思主义所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不合理分工和巨大贫富差别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结果。

1978年中国走上对外开放道路首先是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有发展经济人民才能幸福,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在社会主义发展失误后,中国重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从技术先进、经济管理有科学之处发展到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认识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到借鉴其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在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现突破以后,大规模多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亚洲四小龙等一些国家(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是开放初期探索如何开放的主要参考。如果问理论上是什么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应当归结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这一条才有可能从外部的成就中总结出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发展。

思想解放使中国重新评价比较优势论。贸易对各国都有利,不论一国是先进还是落后。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不仅让中国认识到贸易的积极意义,而且认识到多种形式国际合作的互利作用。要素禀赋论的传播使人们认识到劳动力富裕是中国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开放战略的出发点。中国应当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出口,也应当利用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这些新认识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除了学术上引进西方各种贸易投资理论外,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理论。全球化机遇论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就能抓住各种有利的外

部条件,利用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引进外资,发展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收入。机遇论既告诉人们开放有利,又给国人一种紧迫感:机遇是有时间性的,可能稍纵即逝,必须牢牢把握。从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到随后全国各地在外贸外资指标上的竞赛式全面发展,都证明机遇论对中国发展的重大影响。

挑战论又从另一方面告诉国人开放的影响。开放并不意味着外部财富源源流入,它可能对国家产生冲击,可能在总体有益下包含着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利。正是对挑战的清醒认识,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沿海到内地的先后开放,产业外资投资准入的逐步扩大,进口关税水平的逐步下降,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管制的逐步放宽,等等。正因为对全球化挑战的高度清醒,中国在不断扩大的开放进程中有效地防范了外部冲击,特别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等多次外部动荡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中国提出的,其理论成果在国际上也是极其丰富的,但是作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理论依据,却并非仅仅照抄国际概念,而是发现其与中国的关系,赋予其特殊的内涵。

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国人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普遍认识,也是这一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加入这一组织的努力和决心表明,中国不仅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特征,而且认识到接受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更为有利的。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既能全面获得各国市场竞争的公平地位,又能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入世以后中国全面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一体制的开放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是从世贸组织的规则与中国的入世承诺出发的。

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国家的整体发展理论,也包括对开放的指导。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这一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开放型发展指导思想的升级。中国不仅要外贸外资的更大数量,而且要更高的质量。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要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对外开放上不能搞粗放型模式。

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和包容性发展观等重要理论,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各国发展的相互和谐。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特别是全面走上了现代工业化道路后,无论在资源需求上还是在产品出口上都形成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和谐世界理论和包容性发展观对中国在实现了高速发展后如何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相关的还有和平发展理论,即中国清晰表明在国力持续增长的同时坚持和平方针。作为国家的战略宣誓,和平发展不是经济战略,但也对中国如何处理与各国的经济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承担一个大国应尽的世界义务,做负责任大国,这是中国在国力持续提升后的重要指导思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采用扩张性国内政策抵御危机,以此为标志,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不再只是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和机遇,而是把世界的和谐稳定作为自己的责任。负责任大国理论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主题。这既是中国关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主张,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对经济全球化共享机遇,共担风险,共迎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在各国普遍受益的情况下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世界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退群违约和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全面阐发了经济全球化理论,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步意义,提出了国际社会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张。同时,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提高开放水平,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旗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方案。以中国两千多年来与世界文明交流的互利文化为基础,中国倡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设计了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总体方案。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人心相通,“五通”全面规划了共同发展的路径、内容与目标,为各发展中国家借助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出了宏伟而又现实的战略道路,是现代发展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探索发展道路,发展经济学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丰富的发展理论。从总体上看,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是回答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世界经济被视作发展的外部条件,理论上分析的是外部条件如何影响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在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发展”这一主题。作为率先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带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并倡导世界各发达国家参与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不同于世界现行的发展援助机制,也更广泛地动员了世界援助发展的资源。这是基础设施先行发展道路从一国推进到全球的理论,是新兴经济体如何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也是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新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也创新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和道路。现行的各类国际组织和协定下的各种全球治理体制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创设的,其中许多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治理模式往往以承诺为前提,以规则为基础,以组织为平台,在许多情况下不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成熟的国家治理架构和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长期未得到有效发展的原因正在于缺乏“五通”所指出的相关条件。“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共识和政策沟通为前提而不以约束性市场开放承诺为前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而不以复杂的难以达成的各种规则为基础,以具体建设项目为平台而不以需要长期谈判才能建立的多边国际组织为平台。这一推动国际合作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因而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进入新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经济强国的目标已日益临近。对外开放理论从是否开放、怎样开放进一步上升到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基于产业或地区差异化优势的理论上升为全面开放深度融合参与全球化的理论;突破发展瓶颈的理论上升为在实现全面小康和富裕基础上谋求强盛的理论。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了新时代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

在探索发展道路上注重理论探求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外开放的理论和中国经济关系的理论是中国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0年的回顾表明这些理论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更指导着中国未来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战略。

五、经济体制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国内条件

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不是一个由市场自发选择对外经济关系的国家,如企业根据经营原则决定是否出口和对外投资。如前所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基于国际环境、发展目标和理论依据所做出的战略选择,而国内经济体制对实现一定的对外经济战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无法选择开放型发展战略。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的要求,也是与有限的对外经济联系相一致的。没有自由贸易也就没有外部市场对国内的影响。有限的进出口是计划的一部分,中央集中的管理也包括出口的计划管理,对外贸易调剂余缺必须由中央集中决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履行国家计划,其中也特别重视出口计划。出口产品往往是更高质量的代名词,这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出口产品生产过多或市场变化就会转为内销。企业只要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意义上的任何积极性。出口创造的外汇收入是国家集中

管理的稀缺资源。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如产业升级和重大科技项目完全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更加强了集中计划的要求,因为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赶超就需要集中有限的财力进行攻关,对此进行市场化选择是不可能的。因此,虽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国内的制度选择,但无法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更加强了对这一制度的依赖。前30年经济发展成果不足有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集中计划体制缺陷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1978年选择了开放也就是接受外部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集中计划经济也就有可能改变而且需要改变。

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开放是对外部市场的竞争性互动,也要求国内体制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在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时形成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导向型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中央政府确定发展方向,制定开放与发展的整体战略,各级地方政府从各自条件出发制定地方发展规划,运用与中央分权下的政策制定权推动发展。尤其是国内改革不是一步到位完成的,旧体制机制的障碍长期存在,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乃至第一线工作的干部具体应对处理,以政策的灵活性化解制度的滞后性。这种体制机制在开放包括外贸发展和引进外资上特别重要,因为开放面对的是外部市场,外国企业要求中国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而中国暂时还未形成制度,由地方政府和第一线干部具体处理是最有效的方式。这种以政策灵活性弥补制度滞后性的方式解决了大量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提高了政府服务市场的水平。所以,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外部市场机制向国内传递的过程,是国内体制的转型过程。

选择开放型发展战略后中国迅速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这与上述体制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国没有一步到位把体制改变成完全市场经济,而是在原体制基础上进行放权式的改革。改革保留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从中央一个积极性变成了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多个积极性;改革也适应了开放型发展的要求。市场不是一步到位建成的,政府不是完全退出的,各级政府为开放型发展营造环境,培育市场,这就是中国从1979年特区建设开始到90年代国家全面开放阶段的特点。

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优点:一是具有两种动力,一种是市场机制,另一种是政策灵活性;二是具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企业,另一个是政府。这样的体制决定了两种来源的经济增长同时实现:一是要素投入增长型,来自外部的资本流入弥补了资本短缺,国内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及跨地区流动使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批租权使土地要素在所有制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有效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外商投资为中国带来了新技术和新产品,也包括更好的管理,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外资流入带来了竞争,国内市场化改革下崛起的大批民营企业在外来压力下以技术创新求生存也促进了技术进步。

可见,区域发展导向型是一种适合于开放型发展的体制,它显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动车组或高铁模式:不同于绿皮车单靠一个车头拉,各节车厢都有动力,所以形成高速。在引进外资与促进出口上各地政府间展开了一场发展竞赛,这就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

入世是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也是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不仅进口关税大幅下降,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大幅扩展,而且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各种不合理的出口补贴被取消,一大批法律被废除、修订或者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得以完善,特别是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向着规范透明的方向转变,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定期进行政策通报。简言之,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制度性开放,体现了国家从机制上参与全球化到体制上参与全球化的进步。

制度性开放在一个新的意义上与开放的扩大相适应。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开放,承认国际公认的争端解决机制才能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同时要消除不合理的价格竞争行为,特别是政府补贴下的竞争。以世贸组织的规则为标准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才是在深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所以,入世后的扩大开放核心意义在于中国不再只依靠劳动力廉价和政策让利来吸引外资,提升出口竞争力,而是要营造更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使中国经济体制融入全球化。由此可见,体制改革与扩大开放

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晰。

2013 年起以自贸试验区为平台的开放探索在几年中从上海一地扩大到包括海南在内共 12 个省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标志。自贸试验区的方针是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试验找到在整个国家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针在于国家看到了经济全球化正在出现新的态势。当时,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诸多双边和诸边国际贸易投资协议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新规则。新规则超越了世贸组织以边境上措施为主的市场准入原则,涉及大量边境后措施;市场开放本身也采用了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更高水平更加透明的形式。这一态势向中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制度要求,中国要实现制度性开放必须以这些新特点为参照。然而中国的体制毕竟与这一高度市场化和开放性的要求有一定距离。自贸试验区的探索首先集中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上,其核心是最大程度地提高贸易通关和外资审批的效率,同时保证维护海关监管和国家产业安全。这全面触及到国家各部门的现行管理制度及相互联系。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模式改变了此前的外资政策体制,使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的分类转变成非禁即可的更为清晰的负面列表,不仅市场更加开放,而且否定了审批制下的不规范不透明体制。金融改革开放探索旨在突破长期以来开放的最困难部门的制度安排,实现更完善的市场化金融体制。自贸区对企业设立的自由贸易账户是外汇管理体制中的一大探索,以实现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自由兑换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企业外汇使用上的最大自由和便捷。这些改革以各地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方式推进,一方面保证改革在最困难领域的有序突破,另一方面也给各地在新形势下探索开放模式提供了操作空间。自贸区试验不仅使国家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开放要求,而且为国家在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在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准备了条件,争取了主动。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逆全球化立场日益明显,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并主要针对中国。美欧在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指责中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美欧的市场经济运行标准与中国经济体制中政府发展导向职能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然而中国的改革部署事实上已经明确了基本目标,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取向与美欧的更加市场化的开放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兼容的,而中国的自贸试验区改革探索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因此中国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总要求,全面提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总战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立足于国内制度建设的根本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的新思路。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随后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扩张性政策应对危机带来了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同时又出现了一些短板。企业预期低迷,投资需求不足,消费者对高质量消费的需求导致购买力外流,国内需求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的开放条件下政府调控经济的制度设计。在基础设施、重点行业和短板部门中政府要积极有为而非放任不管;要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引导市场资金流向而不是靠政府债务。人民币不但要稳定汇率,坚持汇率改革方向,而且要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以适应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提和“一带一路”建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改革国内体制的思路而非宏观政策调控的思路,从供给侧方向而非需求侧方向调控经济,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关联,外部影响增大而国内机制变化的新条件下的改革取向。

(责任编辑:张薇)

Contents & Abstracts

70-year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economy : determinant factors and historical logic

Zhang Youwen(3)

70 years past since the PRC foundation ,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econom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periods , each of which has specific meanings as well as successive progressions. There are four determinants of the strategy options for external economy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the external surrounding , development goal is the principal direction , theoretical support is the oriental mindset ,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 is the progressive condition. For the four periods , the change of the four determinant factors proves that there is endogenous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logic for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Demand Shock , Innovation and Export Quality

Zhu Xiaoming Song Huasheng(13)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 improving export quality is a challenge because of increasing global uncertainty. Following Aghion et al. (2018) ,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duct quality to develop the model indicating the effects of demand shock. We find that demand expansion has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quality , and the more productive firms the larger effect. The mechanism of demand on export quality contains two components: direct scale effect and indirect competition effect. We test the model using Chinese micro firm-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06. Our empirical results perfectly fit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The conclu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dvocated by China.

Green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Service Export: A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Service Sectors in 9 Developing Economies

Wang Shuli Wang Xuliang Hu Zongbiao Men Xiaolu(29)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service trade on green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developing economic entities. Th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6 service sectors in 9 developing economic entities ,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service export on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por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green TFP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Further group testing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export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the green TFP in producer services , but it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at of consumer services. We try to analyze the sectoral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port levels and industry attributes. For China's sample , service export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 green TFP of the entire service industry , producer services and consumer services. In addition , control variables , such as energy intensity , technology gap , capital labor ratio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green TFP in service industry.

Tax Competition , Firm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Behavior

Peng Xin Jiang Wei(43)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jurisdictional tax competition , technical progress , productivity and firm export behavior , and estimates the intergovernmental tax competition of business tax , corporation income tax and value-added tax through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using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from the year 1998 to 2006. Then this paper conducts